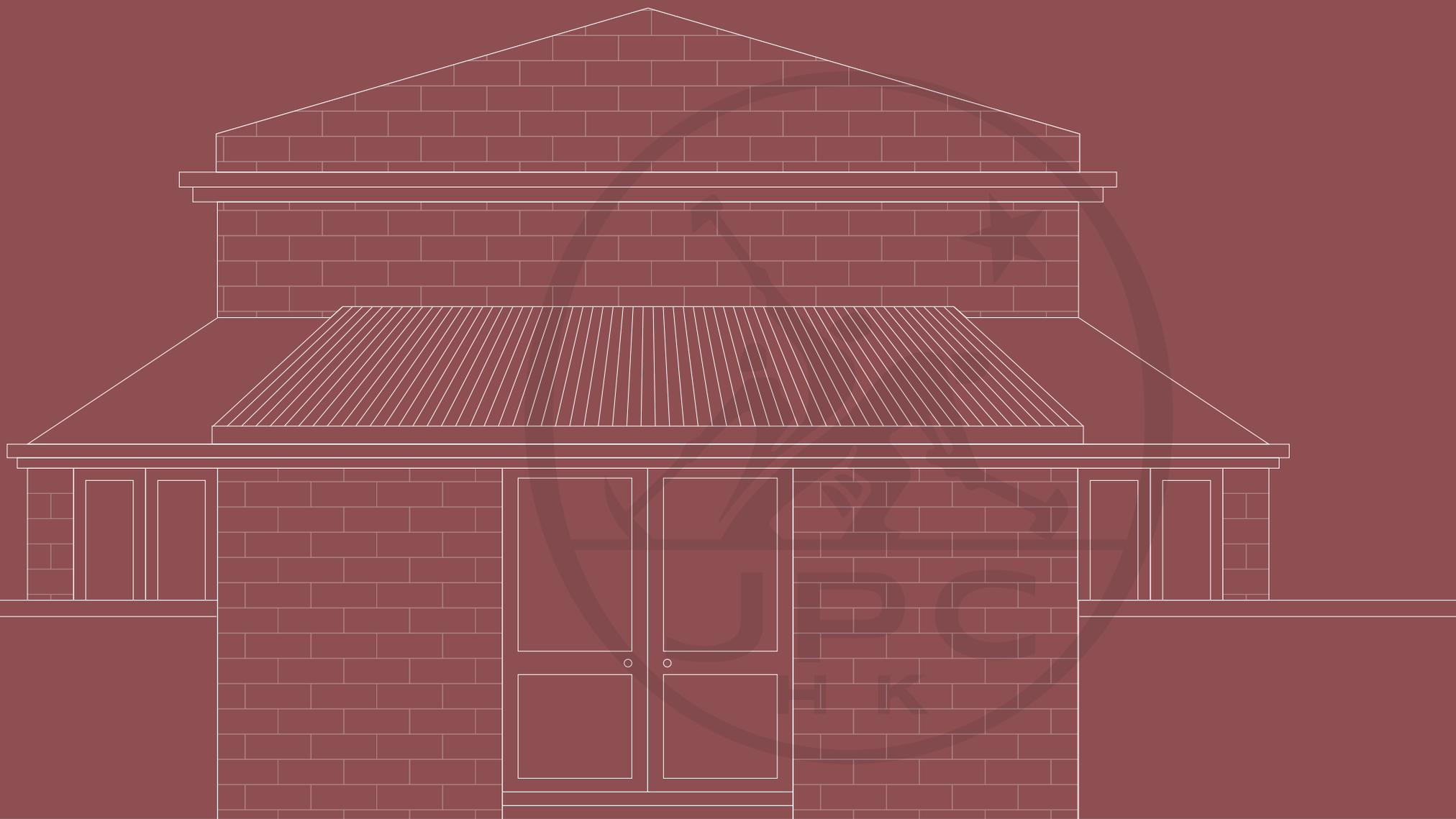


第二章 樑棟百年成：建校



民生書院的出現，可算是 20 世紀初九龍城及啟德一帶城市發展的直接產物，而這些發展亦與 1900 至 1920 年代香港、東亞以至世界的發展息息相關。在 1920 年代，東亞與中國正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波。1914 至 1918 年，一戰不但使歐洲發生巨變，亦打破了亞洲的國際秩序，更使中國出現了一連串政治以至思潮上的轉變。1912 年民國肇建後，政制發展舉步維艱，同時出版與文化的風氣因政局混亂而相對開放，激起了各種思潮的湧現與爭鳴。¹一戰後，蘇聯在混亂中誕生，其政府聲稱放棄在華特權，使中國不少知識分子一時間對蘇聯及其革命論述趨之若鶩。蘇聯亦嘗試在中國尋找盟友，並最終與北方軍閥馮玉祥及南方孫文領導下的國民黨合作。²

與此同時，英法等國在戰爭中元氣大傷，難以維持在華地位，更面對在蘇聯以及其戰時盟友日本的挑戰。後者亦希望以不同手段加強在中國的影響力，例如在 1916 年與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以及在 1918 年與北京政府簽訂的「西原借款」等。希望利用國際形勢改善其內外地位的北京政府於 1917 年毅然參戰，並容許英法兩國招募逾十萬華工到西線³及中東工作。這些行動使北京政府得以參加巴黎和會，嘗試把《二十一條》的影響減至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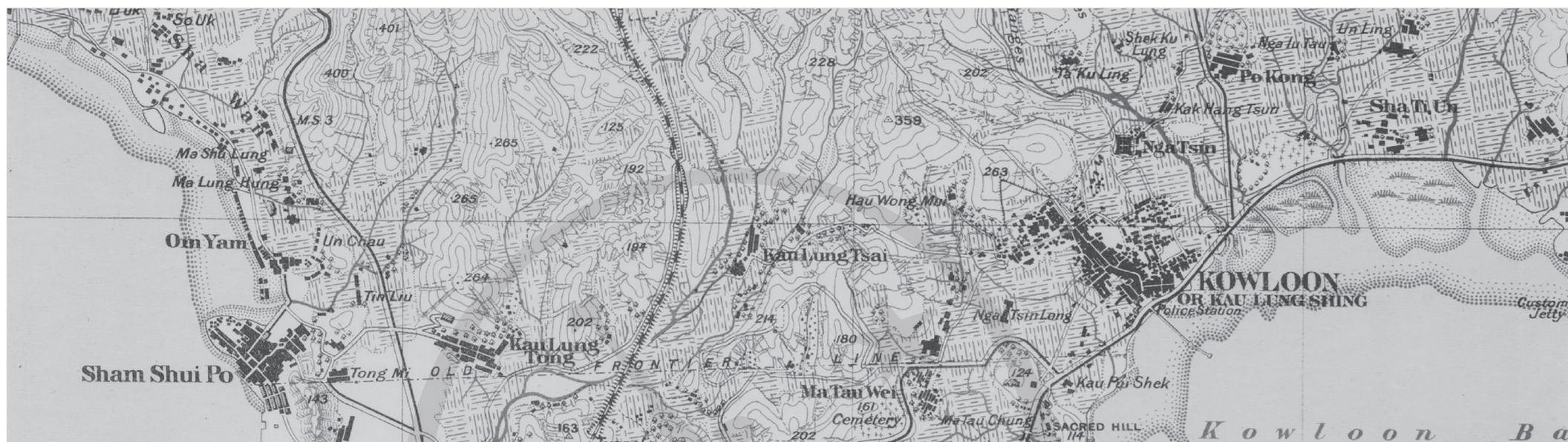
並使列強同意就中國問題另外開會討論。可是，結果仍使渴求一舉改善中國國際地位的國人不滿，特別是處於民族主義思潮下的知識分子。對巴黎和會的失望成為五四運動的催化劑，這個運動對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影響深遠，由於 1924 至 1925 年北京政府因第二次直奉戰爭崩潰而引發了其後的巨變。在香港，五四運動仍有一定影響，其中民族主義情緒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加上社會不公及福利匱乏亦陸續引發海員罷工、省港大罷工等大規模反英運動。⁴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段時期，雖然民族主義是中國知識群體的共同語言，但不同思想、世界觀，以至知識體系亦在中國流通爭鳴。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認為「覺醒」(awakening) 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主題，而其中民族主義扮演了重要角色。⁵ 另一方面，中國的青年亦從不同渠道中接觸現代知識和思潮。自從清廷派遣幼童到美國學習以來，中國出現了一代又一代世界觀與英美接近的知識群體，他們既有在聖約翰大學等教會學校畢業，亦有遠赴海外負笈者 (美國自 1908 年起把庚子賠款用於中國教育，這筆經費支持清華大學的建立以及資助赴美的學生留學)。日俄戰爭結束後，不少華人知識分子選擇到日本留學，他們既有接受軍事訓練者，亦有到日本大學留學。該群體中最著名者，自然是到日本陸軍振武學校接受訓練的蔣介石，以及在日本學醫後毅然從文的魯迅。此外，部分華人亦選擇到歐洲留學，其中不能負擔學費或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在 1920 年代初勤工儉學，如鄧小平即為一例。⁶ 這些往世界各地留學的華人因其經歷或志趣，所帶來的思想與知識以至世界觀不盡相同，但他們大多秉持善用所學改變自身以至國家命運的想法。在民國政局、俄國革命，以及巴黎和會等背景下發生的五四運動，在 1920 年代初亦影響了香港。民族主義浪潮亦在香港知識界泛起了漣漪，事關不少知識分子大多流動於亞洲甚至歐美各地，部分亦參與香港的教育工作。

20 世紀初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思潮對後來的政局影響深遠，但基督教亦扮演著相當角色。早於 1885 年，各地已出現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 M. C. A.)。1912 年，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組合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Y. M. C. A. in China) 成立，

當時不少知識分子曾在中國各地就學於如倫敦傳道會、浸信會等教會，特別是沿岸地區建立的各級學校，他們既擁有基督教信仰，又有強烈的民族情緒及救國意識，亦認為教育是重要的手段。⁷ 該群體在政界亦有影響力，其領袖之一王正廷 (Chengting T. Wang, 1882-1961) 是民國時期活躍的外交官，曾官至外交部長。1921 年，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 (David Z. T. Yui / Yu Jih-chang, 1882-1936) 更曾以平民代表身份參與華盛頓會議 (Washington Conference)。⁸ 其後，青年會在中國推行公民教育運動，希望實踐普及教育。這華人青年基督教的教育群體，影響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近代教育發展。

在 1920 年代初的廣東，由孫文領導的國民黨和以陳炯明為首的粵省政治和軍事力量本來維持著脆弱的平衡，孫、陳兩人對如何改變中國亦存在路線之爭。自 19 世紀末廣東編練新軍以來，粵省軍人建立了自己的傳統與圈子，這個圈子 (多被稱為「粵系」) 與後來國民黨為主的群體有所重疊，但亦有所不同。⁹ 此外，經濟發達的廣東亦出現了一個網羅廣州、英治香港、法國屬地廣州灣、葡萄牙屬地澳門的華人商人群體，該群體亦因為祖籍、血緣、族群的關係，與 19 世紀中葉以來在東南亞定居的華僑群體有緊密的經濟和文化紐帶。另外，自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以來，在九龍定居的潮州人越來越多，他們部分來自潮州，亦有曾到南洋謀生者。他們在九龍 (及香港) 建立了緊密的商業與社交網絡，部分亦因信奉基督教而更為團結。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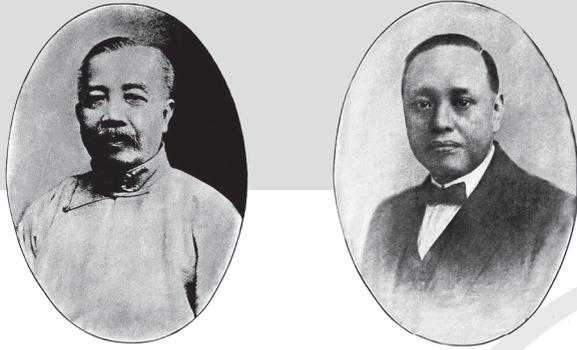


圖片 1：1913 年新九龍地圖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

1898 年，清英兩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段 99 年，自此新界及新九龍在管治、防衛，以至行政上成為「香港」的一部分。¹¹ 早於港府接管新界以前，本地華洋紳商已對「新界」的地皮產生興趣，甚至在「六日戰爭」前已開始購入地皮作投資用途。至新界被納入管治範圍後，這趨勢仍然繼續。在近代香港，空間似乎永遠短缺，而且始終是龐大利益與衝突的潛在來源。20 世紀初，由於香港狀況相對穩定，而且經濟持續發展，華人陸續選擇到香港生活，包括相當數量的華人精英。他們在香港社會嶄露頭角，與港府的互動也影響了香港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在此背景下，啟德濱開發計劃出現，促成了民生書院的誕生。

1908 年，華人定例局議員伍廷芳與其商人親戚何啟即思考在九龍灣發展住宅區，但礙於計劃所需太大而未有實行。伍廷芳事

後未有跟進，但何啟卻在 1912 年成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主要股東包括曹善允、區德、張心湖、周少歧、周壽臣、謝蔭墀、黎季裴等。在繼續討論啟德濱的發展前，有必要先交代這批主要股東的關係。他們都是當時華人精英的翹楚，其中有來自在香港和華南社會有相當政經地位的家族。伍廷芳 (Wu Ting-fang, 1842-1922) 可算是當時最早出現的英式華人精英。他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就學於聖保羅書院 (St. Paul's College)，然後赴英接受法律訓練，其後在香港公共事務擔任重要角色，於 1880 年成為第一位華人定例局議員。何啟 (Ho Kai, 1859-1914) 是早期華人傳道人富商何福堂 (1817-1871) 的兒子，曾在英國接受西式教育，接受了法律與醫學的雙重訓練，至 1882 年回港後致力參與公共事務，例如建立雅麗氏醫院 (今西營盤醫院)、西醫書院 (今香港大學醫學院)，推動成立香港大學、擔任定例局議員 (1890-1914)、參與公共醫療 (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公共衛生條例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的建立等。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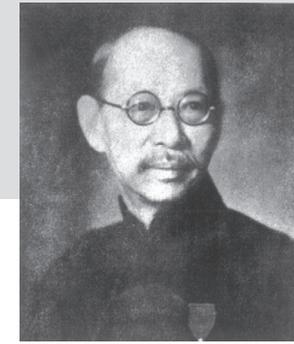


圖片 2：(左) 區澤民 (區德) 先生 (1936 年《民生書院十周紀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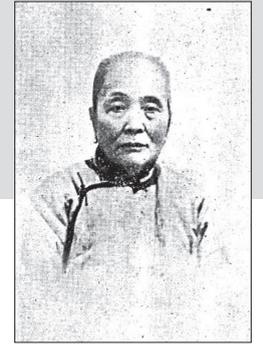
圖片 3：(右) 莫幹生先生 (1936 年《民生書院十周紀念刊》)

周壽臣 (Chow Shou-son, 1861-1959) 於香港黃竹坑出生，曾就讀中央書院，其後獲選為留美第三批幼童，可是計劃因清廷保守分子反對而中斷，後來他雖有到美國就讀小學及中學，但未有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而回國。他長期於清政府工作，曾在袁世凱麾下於朝鮮工作逾十年，直至甲午戰爭爆發、日軍迫近平壤才離開。其後他曾任關內外鐵路總辦等，至民國建立後袁世凱任大總統一職便回香港居住，袁世凱特授予三等嘉禾勳章。他在香港被任命為潔淨局、定例局，以及議政局 (行政局前身) 議員，在公共事務有重要地位，尤在華人社會擁有極高聲望。周少歧 (1862-1925) 則是富商周永泰的兒子，比周壽臣年輕一歲的他也在中央書院就讀，兩人算是師兄弟。周畢業後加入港府船政署，其後創立保險公司、銀號等。區德 (Au Tack/Au Tak, 1840-1920)，又名區澤民，來自廣東南海，是比較傳統的華人紳商，在中環一帶經商發跡，其後業務延伸至地產。張心湖 (1866-1932) 則是來自澳門的富商，亦曾於香港投資地產。¹³

至於在 1920 至 1950 年代擔任民生校董的曹善允 (Ts'o Seen-wan/Tso Seen-wan/S. W. Tso, 1868-1953) 為伍廷芳、周壽臣和何啟等人的後輩，但其人生軌



圖片 4：(左) 曹善允博士 (1936 年《民生書院十周紀念刊》)



圖片 5：(右) 伍廷芳夫人 (1936 年《民生書院十周紀念刊》)

跡與前輩亦有相似之處。曹於澳門出生，是商人曹有的兒子。他在 1882 年先到上海就學，然後亦負笈英國學習法律，最終於 1890 年畢業，並於六年後獲得執業律師的資格。1897 年他在香港經營獨立的律師樓，成為當時極罕的華人律師樓，亦積極參與各種商業。他亦活躍於公共事務，特別是籌辦學校。除了本書的主角民生書院外，他曾參與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校、官立漢文學校 (金文泰中學前身) 等學校的建立，又曾成為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校，以及聖保羅書院的校董。¹⁴ 香港大學籌辦時，他協助籌款，大學成立後成為校董，1924 年獲港大頒發榮譽法學博士，1928 年獲 O. B. E. 勳銜，1935 年獲 C. B. E. 勳銜。

這批精英並非臨時因為啟德發展而組成聯盟。他們部分成員均來自相同的姻親及親戚關係網絡，而他們亦屬於同一個社交、文化和商業圈子。伍廷芳的妻子何妙齡 (1847-1937) 是何啟之姊，伍廷芳的兒子伍朝樞 (1887-1934) 則迎娶了何啟的女兒何瑞金。何啟的長子何永貞則是區德的女婿，因此何啟與區德是親家。¹⁵ 周壽臣、張心湖、曹善允等則經常同時流連於社交與商業圈子中。